

党群关系的态势变化与时代要求

刘红凇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部 上海 200233)

摘要: 党群关系问题始终是我们党革命与执政的根本政治问题,但党群关系是历史的、发展的。革命年代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取得了胜利,其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维护与实现群众利益、发扬优良作风。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在变化:已从封建时代的“臣民”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公民”,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人”,从封闭年代的“封闭人”转变成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人”。党与群众的变化必然导致党群关系态势变化与关系重构。新时期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党理政的各民主环节,实现党群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常态化。

关键词: 革命党;执政党;党群关系;态势变化;时代要求;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5-0003-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Masses Related with Changing of Situation and Demands of the Time

LIU Hong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litical Parties, Shanghai Party School of CPC,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lways i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topic of CPC whether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or reign, which will be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the CPC have won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by relying on the masses, contacting closely with the masses, following the mass line, maintaining and realizing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style. The masses has been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o the ruling Party, they have transformed from "subjects" of feudal era to independent "citizens" of the new era, from "unit - peopl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to "social people" of the market economy era, from "closed - people" of the closed era to be "information - people" of the information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 and masses will inevitably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masses.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we must carry the mass line of the party through each link of democracy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收稿日期: 2015-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编号: 13&ZD0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研究”(编号: 12BDJ030);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 刘红凇(1969-),男,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政党研究所)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项目负责人与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

government and achieve democrat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Party; ruling Par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mass; changing of situation; changing of the times; people's democracy

政党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从来都是民众选择政党、而非政党选择民众,这是政党与民众关系不可逆转的铁律。“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 (P442)} 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深谙此道。高度重视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毛泽东等曾经把党群关系比喻为种子与土地的关系、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等,以彰显党群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党群关系是具有中国语境的一个政治概念,是指政党和群众之间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党群关系既反映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状态,更是一种互动过程。因为政党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群众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党群关系必然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变化的,我们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党群关系问题。那种认为党群关系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的”、是“静止不变、一劳永逸的”的观点,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有害的;不仅不利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党群关系,也不利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三大历史时期,毫无疑问,革命时期是党群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既有党的性质与宗旨使然,也有革命环境恶劣之迫使。根据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认识革命时期党群关系的态势与成功之道;从政党转型、“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视角,结合时代发展变化、政党变化、群众变化、党群互动机制变化等多方面因素,深刻认识党群关系的态势变化与时代要求,无疑对新时期改善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群众具有重要启示。

一、革命时期党群关系的态势与基本特点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 28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尽管这一历史时期又可细分为中共创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但从政党形态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革命形态”的群众性政党,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体制外政党”,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属于“非法政党”,为反动当局所禁止乃至绞杀。这显然与当时的“体制内政党”、“执政党”、“合法政党”等有本质区别。要深刻把握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基本特点与党群关系态势,需要结合政党生态、政党观念、政党使命、党员构成、党建目标等来具体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乃至所有共产党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非“选举政治的产物、民主政治的工具”。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 (P272)} 对于阶级斗争,列宁曾经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3] (P127)}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与共产党的诞生,正是适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理论、实践与价值取向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点。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 (P285)} 然而,共产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阶级政党,而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 (P285)} 在价值取向与利益代表方面,也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 (P285)} 可以说,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广大

劳动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具体到中国,尽管当时的国情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列宁时代的俄国有明显不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数量很少;尽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非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当时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产物,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并兼顾自食其力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价值取向。这正如党的七大党章所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现代西方政党的一般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也不适用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因为现代西方学者通常把政党定义为“选举政治、民主政治”的产物,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认为“政党”一词在十九世纪随着欧美代议制的发展和选举权的扩大而产生。它指的是与一个或更多的政党竞争而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而言。这显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为对象的,无法解释共产党乃至民族主义政党的产生与发展。

进一步而言,从政党使命与现实任务看,共产党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消灭私有制为根本任务的政党。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 P286}具体到中国共产党,从根本目标上看,这与马克思的主张是一致的,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但是,由于当时革命的形势与国情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现实任务也与马克思所言的“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有所不同,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所言: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所言的“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简单说,反帝反封建、实现民主独立与主权统一、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可谓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任务。

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与党建目标看,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其中大多数为先知先觉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1927年五大前后,全国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其他约占11%,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工人、农民占党员的绝大多数。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21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党员人数达到448.8万,其中工人党员大约30万左右。^[4]从党员成分或党员出身看,尽管对革命时期党员成分构成难以准确数据为据,但可以肯定地说,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以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干部为主,甚至可以说,农民出身的党员占革命时期中共党员的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业大国,无论是工人、军人、知识分子还是干部,其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当时的军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军人”、当时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总之,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与切不断的亲情。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劳动人民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联系民众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从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看,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在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工人数量很少的农业大国,“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了建党初期乃至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打破“唯工人成分论”、吸收农民中的革命者入党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5] P602}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看待,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既加强了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又对党员进行了思想改造。

二、革命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成功之道

毫无疑问,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党”、“体制外政党”、“群众性政党”的形态展示于世人并开展革命工作的。从政党政治一般规律看,“革命党”与“执政党”、“体制外政党”与“体制内政党”、“干部型政党”与“群众性政党”在联系民众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而言,“革命党”、“体制外政党”、“群众性政党”产生于社会、来自于民众,与广大劳动人民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联系民众的政治优势;同时,由于“革命党”、“体制外政党”缺乏像执政党那样的执政资源,它们只有植根于民众才能生存、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发展;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革命党”寸步难行。

当然,对“革命党”、“体制外政党”、“群众性政党”而言,能不能将联系民众的天然优势转换为“革命胜势”这既取决于政党性质,也取决于政党宗旨与群众观点,更取决于政党的实际作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指出:要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6] (P136)}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仅仅有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还不够,还必须用胜利的结果来证明、用满足群众物质利益来证明,因此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资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都不能实现领导。”^{[7] (P1273)} 总之,即使对革命党、群众性政党而言,实现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也是有条件的,并非与生俱来。概括说来,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之道,主要包括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战斗力,科学的群众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辉煌的胜利业绩,满足与实现群众利益,发扬优良作风,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等多个方面。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成功之道,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 (P1031)} 毛泽东甚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8] (P1094)}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一方面,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强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9] (P354)} 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得很清楚也很彻底。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强调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革命时期,面对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现实,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赞同“农民万岁”的口号。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党群关系。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曾将党群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种子与土地的关系”,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7] (P1162)} 另外,我们党还把党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等,以此来说明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增强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种子离不开土地、鱼儿离不开水,否则,就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反之,土地没有种子还是土地、水没有鱼还是水,尽管土地可能因此变得贫瘠、水因此变得浑浊。再一方面,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与方法,即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法。对此,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5] (P409)}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8](P899)}

其次,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物质福利,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即使在艰难困苦战争年代,至少也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自问自答: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宣传为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人,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却获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来自人民、以人民为靠山、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可以说,在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分田地”等都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不侵害民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的言行与政治本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一席话讲得淋漓尽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0](P138)}

再者,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尊重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否则,即使给群众以利益,若不尊重群众、方法不对头,群众也不一定买账。正是因为家长制、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阻碍着干部、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影响党群关系,因此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可谓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11](P254)}主张“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建国以后毛泽东甚至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12](P324)}总之,革命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不仅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还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公式主义、机械主义、惩办主义,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强调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等等。这一系列思想内容,从毛泽东战争年代的一些论著如《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人民服务》《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等可见一斑。

总之,在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好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的群众观点、好的路线与方法(群众路线及其方法)、好的作风,而且说到做到,才赢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心拥戴与大力支持,才会出现“最后一粒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的战争奇观,才能造就“党的秘密就是人民群众的秘密,党的困难就是人民群众的困难,党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的胜利”的党群心连心局面。正是由于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相关资料显示,抗日战争结束时党员达到120万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已有19个,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同样,没有广大群众的倾力支持,就不可能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正如陈毅所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进一步而言,新中国的成立,与其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如说是“民心出政权”。因为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看,即使在1948年11月—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战略大决战中,共产党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与军费方面还远远不及国民党。有资料显示,当时国民党军80多万人参战、人民解放军60多万人参战,国民党拥有先进的美军装备、人民解放军是“小米加步枪”和从敌军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在“敌强我弱”、军事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呢?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与“毁家支前”式的支持。

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党群关系的态势变化与时代要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从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体制外政党”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与“体制内政党”。时至今日,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此同时,今天的群众

与革命年代的群众、计划经济年代的群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建党 90 多年、执政 60 多年来,政党的发展变化、群众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导致党群关系态势的变化,也必然会导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与机制的变化。从战后世界政党政治基本情况看,战后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党存在着一个从“原则型政党”向“利益型政党”、从“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乃至“官僚型政党”转变的趋势;一些国家的政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也存在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到代表少数权贵利益的危险。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破解执政周期律与政党政治中的精英政治怪圈,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这是一大政治难题。

的确,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尽管在革命胜利前夕与胜利之初,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会带来党群关系的新变化,并告诫全党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 (P1438)} 1956 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13] (P214)} 毛泽东甚至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4] (P28)} 甚至把党群关系上升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2] (P460)}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刻指出: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关键是看党的政策对不对,人民是不是从中得到实惠,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执政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告诫全党“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5] (P354)} 然而,这并不能避免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新挑战甚至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

当前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概括说来,就是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就是党内存在的种种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问题,就是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具体到干部身上,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16] 进一步而言,当前权力异化、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现象比较突出,“权力部分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家族化”乃当今权力异化的基本脉络;有的党员干部不是把履行岗位职责作为个人应尽义务,而是“错把岗位职责当奉献”,以至于事难办、脸难看、“吃拿卡要”。干群对立、“干群失联”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党员干部“对上负责、对下敷衍”,习惯于联系领导、联系企业与商业精英,不愿联系民众,缺乏联系群众的情感、动力与压力,甚至缺乏联系民众的能力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关系、严重削弱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心与支持。

从成因上看,既有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三观”异化问题,也有治党不严问题,还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良思想影响问题。但从政党政治发展角度看,一方面,当前党群关系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环境变化引发的。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的转变,人民群众也在转变。时至今日,广大民众已经从封建时代的“臣民”“顺民”转变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公民”,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人”,已经从封闭年代的“封闭人”转变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人”;而且,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党与民众的这种时代变化,必然会引发党群关系态势变化与党群关系重构问题。另一方面,新时期党群关系之所以出现许多没有解决好甚至愈演愈烈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思想僵化、党

群关系模式僵化、传统方式失灵等造成。尽管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党就开始思考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问题,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革命党”思维始终挥之不去,“执政党思维”迟迟建立不起来,依然习惯于用战争年代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主要依靠党员干部自觉性来联系民众,适应群众要求与时代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的党群关系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因此,新时期我们党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始终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适应党群关系的态势变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与群众观点的基础上,实现党群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常态化。这要求我们:要从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来审视“群众路线”与“党群关系”问题,将群众路线升华为“民主路线”并贯彻到治国理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其中关键之处有三:一要将群众路线贯彻到选人用人环节,实现选人用人的民主化制度化,正确处理好“组织提名与群众选举”的关系,切实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来源与“权力授受关系”。只有权为民所授,才能权为民所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问题。二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满足、实现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人民高兴、人民拥护、人民支持为科学决策的根本标准,而非以“领导高兴、干部高兴、既得利益集团高兴”为标准,克服业已存在的“以物为本”、“以GDP为本”、“以政绩工程为本”倾向,避免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者绑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计民生,真正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以此来保障与实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三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真正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参考文献:

- [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孙应帅.史诗般的辉煌巨变: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N].光明日报,2011-07-05.
-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4-20.

(责任编辑:郭荣华)